

清华社会学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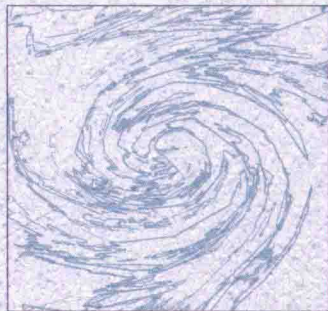
第七辑

主 编
沈 原

副主编
王天夫
严 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办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

No.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清华社会学评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办

第七辑

主 编
沈 原

副主编
王天夫
严 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七辑 / 沈原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201 - 0928 - 4

I. ①清… II. ①沈… III. ①社会学 - 文集 IV.
①C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648 号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七辑)

主 编 / 沈 原
副 主 编 / 王天夫 严 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佟英磊 刘俊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928 - 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严 飞	1
-----------	-----	---

学 术 论 文

后现代性，还是新现代性?	谢立中	5
社会运动参与动机的整合模型		
——以我国反日游行为例	周 敏 王晗宁	35
当代中国研究之转型	Andrew Walder (魏昂德) 著 严 飞 译	65
地方层面的权力：增长联盟理论		
..... William Domhoff (威廉·多姆霍夫) 著 周丹丹 译		82
乡归何处：农民迁移的“差序格局”及其逻辑		
——鄂北三村考察	袁方成 杨 灿	122

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八十周年

时代·个人·学问：费孝通与《江村经济》	陈心想	145
走出费孝通悖论		
——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	陈云松	161

专题讨论： 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

181	当前社区研究的三个面向	李培林
184	“三社联动”实践与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建设	王思斌
190	关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李友梅
196	农村社区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	陈光金
199	“一带一路”：中国社会学发展新空间	施国庆
206	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与“去行政化”	田毅鹏
210	谁的社区？谁的治理？	毛 丹
213	反思社区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文 军
219	人口老龄化问题与“问题化”研究反思	江立华
223	《清华社会学评论》征稿启事	

卷首语

《清华社会学评论》是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自 2000 年创刊以来，始终以“面对中国社会真问题，关注转型期实践逻辑，推动本土化理论研究”为宗旨，刊发过许多在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近年来，《清华社会学评论》开始以热点主题形式组稿出版，通过热门主题的选取、独到的视角、精辟的论述，掀起了学术界对“面向社会转型的民族志”“新生代农民工”等问题的讨论热潮，为社会学学界搭建了一个交流共进的学术平台。

本集刊从 2017 年起改版为每年两期，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期。本期的学术专题研讨聚焦在两大主题上。第一大主题是纪念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 80 周年，共收录两篇文章，分别为陈心想所撰写的《时代·个人·学问：费孝通与〈江村经济〉》与陈云松的《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经典作品《江村经济》对 80 年前剧烈变迁的中国乡村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本专题回顾费老调研江村的时代背景与《江村经济》一书本身的形成与影响，并就人文和科学的方法论悖论展开讨论，从而帮助我们对一个知识分子与他的时代汇聚更清晰的认识，厘清作为群体智识体系的社会学本身的人文和科学方法之辩。用费老的话说，即“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

第二大主题则是关注“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2016 年 12 月 10 日，清

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其他五家单位共同发起举办“2016 年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来自国内社会学界相关领域的 30 多位重量级专家与学者到场，并就各自所研究与关注的领域进行了发言。本期专题精选了九位学者的报告，集中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方向。“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对于社会学理论有创新的意义。如何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来激发“社会活力”，这是今天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重要渠道。

本期其他重点学术论文还包括谢立中对西方社会“后现代性”还是“新现代性”转向的理论辨析，周敏、王晗宁从社会运动参与动机的视角对反日游行的实证分析，以及袁方成、杨灿对鄂北三村农民迁移背后的“差序格局”及其逻辑的考察。同时本期还收录了斯坦福大学 Andrew Walder 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William Domhoff 的两篇论文，分别就近年来“中国研究”的学科转向和地方权力结构的转型进行了深度解读。

李 飞

学术论文

后现代性，还是新现代性？^{*}

谢立中^{**}

摘 要：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的到底是“后现代性”转向还是“新现代性”转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争论的渊源实际上主要来自争论双方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而非来自对当前西方社会现实的不同描述和分析。依据双方各自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把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称为“后现代性”或“新现代性”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遵循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理论家们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对于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我们与其称之为“后现代性”，还不如称之为“新现代性”，因为“新现代性”才能够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它的基本性质与特征。“新现代性”这个名称，恰当地表明了人们对当前西方社会变迁的如下判断：西方社会尽管已经和仍在发生着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它的基本性质至少目前仍然没有超出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的范畴。

关键词：现代性 后现代性 新现代性

* 本文系笔者约15年前撰写的读书札记之一。今复阅之，感觉所论问题尚未过时，故应王天夫教授之约，刊发于此，以供同好讨论。

** 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一种“后现代”状态或“后现代性”时期的宣称就一直不绝于耳。这种宣称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西方社会就已经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根本性的变化，正在促使西方社会发生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将西方社会导入一个其结构、性质与 17 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时期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种结构、性质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新历史时期，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它。从目前来说，这个最适合它的新名字就是——“后现代性”。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后现代性”论者甚至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差别或对立，不仅使“现代性”这个名称对前者来说已经完全不适用，而且以往那些实际上主要适用于描述和分析“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也已经变得完全过时。为了描述和分析这种“后现代性”，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新的名称，而且需要一种与这种新的社会文化历史状况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理论。

然而，西方社会真的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与“现代性”时期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性”时期吗？“后现代性”——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潮的话——在西方社会中真的已经或正在来临吗？没有人会否认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许多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然而问题是：这些变化真的已经“重大”或者“根本”到了与“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特征完全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将其称为“后现代性”的程度吗？

与“后现代性已经来临”（或者它的更为流行的说法“后现代转向”）的主张者们不同，许多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明确地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断然拒绝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一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性”时期的主张或判断。他们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确实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着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新”到与自 17 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在基本性质与特征上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程度，它们只不过是“现代性”所包含的各种内在趋势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展开和实现而已。我们可以宣称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要意识到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范畴。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属于“现代性”，至多我们可以将它称为一种新的“现代性”，即一种与以往各个历史阶段的“现代性”有所不同的“现代性”。将当前西方社会所产生的那些新现象归诸“后现代性”，完全是一种理论上的

误判。

上述两种宣称孰是孰非？西方社会已经和正在产生的那些新现象到底是标志着“后现代性”的来临还是标志着“新现代性”的来临？这不仅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问题。在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时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着我们观察西方社会的理论视角，而且影响着我们自身的行动目标和策略选择。它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东方”的或者说全人类的问题。弄清楚它的答案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做的。本文的目的即试图就此做一初步的尝试。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的到底是“后现代性”转向还是“新现代性”转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争论的渊源实际上主要来自争论双方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而不是来自对当前西方社会现实的不同描述和分析。依据双方各自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把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称为“后现代性”或“新现代性”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遵循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理论家们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对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我们与其将其称为“后现代性”，还不如称之为“新现代性”，因为“新现代性”才能够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它的基本性质与特征。“新现代性”这个名称，恰当地表明了人们对当前西方社会变迁的如下判断：西方社会尽管已经和仍在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它的基本性质至少目前仍然没有超出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的范畴。

一 从文化转型到社会转型：“后现代转向” 的含义变迁

在当代西方有关“现代”与“后现代”问题的学术文献中，“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的说法在含义上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历史性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相关文献中，“后现代转向”的说法主要指的是西方文化正在转向一种其内在精神与传统的现代文化十分相异的“后现代文化”。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那些讨论“后现代”问题的著名学者们如莱斯列·费德勒（Leslie Fiedler）、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查尔

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哈尔·福斯特 (Hal Foster)、弗·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利奥塔德 (Jean Francois Lyotard)、休依森 (Andress Huyssen)、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乃至哈伯马斯 (Jürgen Habermas) 等人在其著作中所使用的“后现代”一词主要指的是文学、艺术、哲学和建筑乃至科学 (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等各个文化领域中以“后现代主义”思潮而闻名的“后现代文化”。80 年代末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后现代转向”的说法才蕴涵更为广泛的宣称,即西方社会不仅正在转向一种与“现代文化”不同的“后现代文化”,而且正在转向一种与以往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社会”。至此,“后现代”一词才不仅包含“后现代文化”而且包含“后现代社会”的意思。“后现代转向”一说在含义上的这种历史性转变,反映了人们对所谓“后现代转向”认知或理解上的转变,即从把所谓“后现代转向”仅仅理解为一种文化转型到进一步将其理解解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转型这样一种认知上的转变。

“后现代转向”一说在含义上的这种历史性转变也通过相关学术概念的演变反映出来。

在今天的学术文献中,“后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等概念已经形成一个词根相同的概念家族。它们在含义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大体上说,“后现代”一词主要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的简称;“后现代主义”一词主要是被用来指称自 70 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一种与过去的“现代主义”趋势相反的文化思潮;“后现代性”一词则主要是被用来指称差不多也是自 70 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在基本特征上被认为与以往的“现代社会”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现象。然而在西方 80 年代末以前有关“现代”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中,这三个概念在含义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差不多都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文化”的同义词。似乎只是到了 80 年代末尤其是 90 年代,这三个概念在含义上才开始逐渐分化开来。“后现代性”才逐步地演变为“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词。“后现代性”一词含义上的这种转变与“后现代转向”一说在含义上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联。

关于当前的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社会转型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阿兰·图兰尼和丹尼尔·贝尔先后发表他们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著名论断以来,关于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

社会历史时期的看法似乎就已经逐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所谓“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第三次浪潮”“网络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风险社会”“后福特主义社会”等类似概念的风行似乎就是人们普遍认同“新社会来临”说法的一个明证。然而，与“后现代性”这个概念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念虽然传达的也是“新社会来临”这样一种信息，但它们并不明确包含正在来临的“新社会”是一种与自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含义。对于大多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念的倡导者来说，这些概念所指称的那种“新社会”虽然有很多新特征，但在一些最基本的性质上并不一定超出“现代社会”的范畴，它可能只是“现代社会”在新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而已。因此，“新社会来临”的宣称并不等于“后现代性来临”的宣称。但是，上述各种“新社会来临”的宣称开启了通向“后现代性来临”之殿堂的大门：既然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产生，那么对它的“新”意所在，自然就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后现代性来临”的宣称正是通过对上述各种“新社会来临”之说的含义重新做出解释而建立起来的。

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关于“后现代状况”的著名研究者，如利奥塔德、弗·杰姆逊等人，在探讨“后现代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时，也曾经试图将其与当代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各种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变迁过程连接起来，试图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例如，利奥塔德试图以当代西方“最发达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来解释知识的“后现代状态”。弗·杰姆逊则试图以“晚期资本主义”为基础来解释“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出现。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将“后现代”一词限制在用于表示文化转向的范围之内。与“现代性”发生了断裂的仍然只是文化，而不是社会。至于“后现代社会”或“信息社会”是否也具有一种“后现代”的性质，在他们那里语焉不详。然而，正是这种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等概念相连接的企图对“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性”概念含义的转变产生了直接的催化作用：既然“后现代主义”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等社会变迁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为什么不可以同样从一种“后现代转向”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些新的社会变迁过程呢？“后现代”的文化状况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之间在结构与性质上是否有某种一致性呢？

在“后现代转向”之说或“后现代性”概念变迁的过程中,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鲍德里亚以“符码生产”、“拟像秩序”和“超级现实”等概念为工具对当代西方社会所做的描述和分析,消解了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使人体会到“后现代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萌生的“新社会状况”之间的同一性(文化与社会不可分性被后来的学者当作“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研究于是也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显学)。对鲍德里亚理论的解读成为“后现代转向”之说和“后现代性”概念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鲍德里亚本人后来也由此被尊崇为“后现代社会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尽管鲍德里亚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分析最接近于“后现代转向”之说的第二种含义,但在鲍德里亚本人的著作中,这方面的宣称似乎始终是含混不清的。

以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似乎目前尚无人考证出谁是“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性”之说新含义的明确的首倡者,以及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的。^①但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的是,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的观念以及具有新含义的“后现代性”的概念才开始逐渐在学术文献中大量出现并流行开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的含义开始发生分化。在1991年发表的《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一文中,鲍曼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认为它“精确地表达了20世纪在欧洲富裕国家普遍出现的那种社会状况和欧洲在这个过程中衰落的定义性特征,以及这种社会状况在20世纪下半叶的存在形态”(Bauman, 1991)。在1991年出版的《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则更明确地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概念区分开来。“后现代”被认为是后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和描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后现代性”用于指称和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者断裂,它包含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

① 据考证,汤恩比和米尔斯也曾经在“后现代社会”的含义上使用过“后现代性”这个词,但他们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称的“后现代社会”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实际内涵与外延上相距甚远。

社会整体的出现”（Featherstone, 1991: 2-11）。^① 莱恩（David Lyon）在1994年出版的《后现代性》一书中也明确地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作为一种粗略的分析方法，将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一词和强调社会的‘后现代性’一词区分开来是值得的”，并提出“后现代主义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后现代性……则涉及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Lyon, 1994）。罗伯特·顿（Robert G. Dunn）在1998年出版的《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也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一词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但一些作者已经利用‘后现代性’一词来指称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Dunn, 1998）在2000年出版的《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米歇尔·迪尔（Michael J. Dear）也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时代，这个时代以我们在认知事物的方式和创造城市的方式上的‘激进断裂’为特征。那些发生在认识论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决裂可以各自区别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Dear, 2000）。

作为这种“后现代转向”之说和“后现代性”概念新含义流行的自然结果，^② “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也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

① 需要指出，这是费瑟斯通的一部文集，虽然结集出版的时间是1991年，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完成于1988~1990年。

② 为了避免误解，需要立即指出，这里说的“流行”并非指所有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后都自觉自愿地接受和认同了上述概念区分。“流行”只是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了上述概念区分，但并不排除仍然有一些人继续忽视或不接受这种区分。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有一些学者如弗·杰姆逊仍然一如既往地“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概念当作同义词加以使用，用它们来表达各种“后现代”文化思潮。另一些学者，如库马（Krishan Kumar）则从后现代主义已经消解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这一点出发，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后现代社会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符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为轴心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严格区分或者说“后现代性”两种含义之间的严格区分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Kumar, 1995: 101-103）。不过，我们可以体会出，这里的概念等同与80年代末以前的等同已经有了质的区别：以前是将“后现代”等同于“后现代文化”，现在则是更多地倾向于将它们等同于“后现代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与过去以物质生产过程为轴心的“社会”已经有了重要区别。

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应运而生。费瑟斯通在上述著作中就已经区分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指出它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与“后现代性”所指称的那种“新社会秩序和阶段性转变”相伴随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Featherstone, 1991)。克鲁克(Stephen Crook)、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更是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后现代化》。书中明确提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下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并且认为“后现代化”是一个比“后现代性”更为恰当的概念,因为目前正在产生的新社会在具体形式上还是不确定的和有疑问的,“我们没有有关它是什么的确切知识,仅仅知道它不是现代性而已”(Crook, 1992)。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现代化例示了一种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无情的历史性转变中将老的生活方式加以消灭的资本和技术的权力,相反,后现代化则将一些革新性的转折和颠倒(包括一些社会控制和抵抗的新形式)引入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后现代化’指(1)在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和模式方面所发生的变迁,(2)围绕大众媒体而发生的社会和文化重建,(3)资本和文化通过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而发生的重构,以及(4)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兴起”(Dunn, 1998)。

上述引证虽然有限,但足以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正在来临”的宣称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广泛流行并已被许多人接受,“后现代性”在很多人那里也已经演变成“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词。那么,使这些人认同或接受这种宣称的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二 后现代社会转向:与现代性的断裂

费瑟斯通指出,对于主张“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那些人,“谈论‘后现代性’就意味着谈论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者断裂,它包含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Dunn, 1998)。鲍曼说:“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一个有缺陷的变种,也不是现代性的一种疾病状态、一种有待纠正的短暂失调、一种‘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一种由其自身的独有特征来定义的、本质上可行的、能够实际地自我维持和逻辑地自我包容的社会状态”(Dunn, 1998)。沃特斯等也提出:“后现代化